

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内生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保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开创中探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并且强调，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时，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辩证扬弃了文化领域古今、中西的对立式关系，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对话中实现意义的生成，上升至实质性的融会贯通，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准备与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变，以“四个现代化”推动中国开始以独立之态探索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在文化领域进一步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明确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原则，清理了旧的文化教育机构和制度。然而，由于受当时世界两大阵营尖锐对抗及苏联模式影响，加之缺乏实践经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受到严重影响。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在恢复中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概念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此后进一步明确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十四大报告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并提到“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重大战略任务，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创新中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构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202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文化强国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不断改革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推动文化进步，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力量源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导向。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诉求不是空泛、抽象的，而是具体、现实的，要着眼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深刻变革，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生活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要把马克思

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并有机融入精神生活的全链条实践过程中，促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源头活水。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的文化，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意志、尊重和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充分激发和发挥人民创造丰富精神权益。

文化的智慧与力量。要以培育一代代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文化人才为基础，不断完善文化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健全完善文化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优化文化人才评价体系，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指向。要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持续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档次与质量，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助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文化权益。

□姚岱虹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动力

推进理论创新，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要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不断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叙事体系，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持续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识性和引导性的概念群和范畴群，持续为世界人民贡献中国智慧，实现文化上的自信自立。

推进方法创新，科技赋能激发文化活力。要从五千年的中华文脉中汲取深厚滋养，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把握战略主动，积极回应现实关切。要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依托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借助科技赋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演绎和表达，以数智化助推新型文化业态的创新发展。

推进融合创新，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要以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围绕回答世界之问，将党的初心使命、人类的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的经验规律紧密联系在一起，持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致力于贴近不同国际受众，找准中外文化的契合点，搭建可共情、可分享的话语空间，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以文化交流超越文化隔阂，以文化共存超越文化狭隘，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促进社会进步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东财经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法学博士）

注：本文系2023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注意力市场竞争视域下高校学生网络伦理建构与引导研究”（2023GXSZ031）阶段性成果

河套为新质生产力增智赋能激活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河套奋力成为大湾区的科创引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启动以来，以深港河套、粤澳横琴“两点”为结合点，以广深港、广珠澳“两廊”为主骨架，推动创新资源高效集聚。一批国家重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落户大湾区，初步构建起支撑信息、生物、材料等领域的科研需求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其中，河套合作区作为香港北部都会区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天然交汇点，是大湾区内唯一以科技创新为主题，兼具区位优势、制度创新优势及国家战略叠加优势的重大合作平台，被赋予“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强力引擎”的鲜明定位，从而为助推港澳转型升级发展的战略支点。

在2024大湾区科学论坛的开幕式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之一，香港特区政府将把河套香港园区打造成为内地与香港创科深度合作的桥头堡。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表示，澳门将

积极参与“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携手推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如今，河套合作区科创资源加速汇聚，正逐步形成全球化科创生态，奋力成为大湾区的科创引擎及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策源地。截至2024年4月8日，河套深圳园区推进和落地高端科研项目累计超过160个，汇聚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等8个重大平台，苹果应用研究实验室、西门子深圳能源创新中心等8个世界500强企业研发中心，集聚了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香港5所世界百强高校10个项目，引入深港澳芯片联合研究院、澳门大学集成电路微电子研究院等20余个项目。凭借科研人才云集、数字经济基础厚实和科创转化能力领先等优势，河套集聚科创资源来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

型升级，并以科技上的“溢出效应”与空间上的“辐射效应”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助力推进大湾区的区域一体化和创新共同体建设。

在此条件下，河套合作区一方面推动深港共同探索国际先进规则，链接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提高深港的发展能级，并推动区域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催生新质生产力，助推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另一方面以科创为主要引擎，辅以推动科创要素自由流动的创新型制度和吸引港澳科创人才的优惠政策，推进香港、澳门深度参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并以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涌现为助推港澳产业升级释放鲜明的技术红利。

例如，2022年底至今，澳门

大学麦沛然教授团队牵头建立

河套合作区澳门大学集成电

路微电子研究院，以深澳合作为

窗口，联动粤港澳三地资源，推

进芯片研发及跨学科领域的人

才培养、尖端研究和应用，加速

释放产业聚集“强磁力”，助力

“湾区芯谷”崛起。又如，2024年11月21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在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与香港园区同步揭牌。“一所一中心”聚焦高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细胞与基因等前沿交叉领域，加快推动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检查、临床试验等规则与国际接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资源深度融合及研发成果转化。

河套合作区汇聚粤港澳三地优势，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脑科学等领域，承接重大科技项目，链接全球创新资源，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初步形成香港高校、“量子谷”、生物医药、“湾区芯谷”、大数据及人工智能、能源科技等“六大科创集群”。与此同时，依托“一区两园”的优势，推动战略性新兴技术与高端制造业发展，探求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成果，加快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赋能粤港澳科创人才的创新发展，助力大湾区的融合式发展，不断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

□林逢春 梁静鑫

激活河套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能

建立健全科创激励、科创保障与科创成果评价机制，以解决大湾区资金跨境流动、跨境税务服务及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民事权益维护等问题。

同时，加快深圳园区的国际数据专用通道建设，探索建设国际通信出入口局等国际信息通信设施。在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探索建设固网接入国际互联网的绿色通道，形成便利数据安全流动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加快制定粤港澳三地数据跨境流动与使用的统一标准，建立数据要素产权制度和科研人员的资历互认机制，在明晰数据资源持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激发科研人员、机构与科技企业在数据资源协同开发的内生动力和科技运营的创造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提供制度保障。

加强深港澳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打造全过程科技创新生态链。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涵盖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等内容环节，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助于通过推动知识在创新群落间及创新环境间的生成、传递与扩散。以河套为试验田，建立健全产学研合作机制，可有效提高知识协同效应及科技成果的溢出效应，进而驱动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

首先，以政府投资和社会集资相结合的方式，集聚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资源，共同打造数字技术创新转化中心。具体可借助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区块链+众包+众筹”平台，通过实施“概念验证支持计划”与“揭榜挂帅”科技悬赏制，推动校企聚焦

关键核心技术展开产学研用深度合作。重点推动河套域内高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链主”实现协同融合，并联同科技企业、科研机构以设立研究院（所）、联合实验室等方式，加快科创联

同体建设，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四链融合”，筑基新质生产力。其次，支持深港联合举办高端产学研合作洽谈会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专题协商会，链接国际先进规则与资源，提升创新合作网络密度，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科技创新生态系统，驱动更广泛和更深层的知识共享与技术交流，激活新质生产力。

最后，鼓励国企和重点行业有关企业共享成本较高的科研设施与实验室设备，“摊薄”大科学装置的

成本，达成尖端大项目的共创合作，在推动重点行业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同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

当下，河套初显峥嵘、英姿勃发。它汇聚粤港澳三地优势资源，聚力打造科创引擎，持续提升产业链、创新链、科技链和人才链的融合效能；同时，河套联动前海、横琴和南沙构成助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合作平台体系，共谋制度创新之路与科创协同之道，为打造国际科创中心和科技人才高地注入强劲动能，为新质生产力增智赋能，激活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

作者简介：林逢春，广东工业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中心研究员；梁静鑫，中山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理响广东·岭南文论

□洪伟

让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有机融入广州城中村改造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标识。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考察时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广州是一线城市中唯一在中心城区还保留大量城中村的城市，城中村改造也是广州城市更新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东风，广州城中村改造全面提速。2024年以来，广州又重点推进广州新中轴（海珠）、广州火车站、罗冲围、环五山创新策源区四大片区改造。面对新一轮城中村改造，广州市多措并举，积极探索城中村改造新模式，把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赓续历史文脉有机统一起来，取得显著成效。广州的相关探索和实践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片、推动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国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加强制度创新 夯实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根基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广州的城中村不仅数量多、面积广，而且规模大、人口多。据统计，仅纳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的城中村就有272个。由于历史原因，广州不少城中村保留着古民居、古祠堂等具有岭南水乡特色的建筑以及丰富的非遗项目、民俗文化和红色文化。部分城中村还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一段重要历史的见证。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承载了人们的乡愁记忆，是广州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当对其进行传承和保护。

为此，广州坚持“拆、治、兴”并举的理念，在全国率先通过市级立法确立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通过立法赋能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发展，推动老城市焕发新活力。早在2016年，广州就颁布施行《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明确把“加强历史文物保护，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作为城中村改造的六大目标之一。

发展至今，广州的城中村改造渐成“1+N+X”政策体系，即1个总体纲领、N项配套政策、多个落实文件。这些制度规定的出台，为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有机融入城中村改造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推动多元参与 统筹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虑容积率限制、人口疏解压力、历史文化保护等因素，改造难度较大。在新一轮城中村改造中，如何既有效改善人居环境，同时又保护好历史文化遗存，保留城中村原有的烟火气，是广州这座千年古城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2023年9月召开的广州市城中村改造工作推介会暨广州安居集团成立大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历史文化传承保护，高标准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努力走出一条全国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的新路子。基于此，广州结合自身优势特点，在城中村改造中大胆创新，打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在资金筹措上，酝酿成立城中村改造基金，积极撬动社会资本，鼓励和支持民间力量参与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在项目选择上，突出公益性特点，明确要求优先建设民生类、公益类项目，提升新社区

自我服务和自我“造血”功能，为本地居民留住乡愁。在改造方式上，根据不同对象分类施策，尤其对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城中村，在落实相关保护要求的前提下，以核心保护区微改造、其余范围全面改造的混合方式推进。最后，在动力机制上，广州市在市、区两级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和专家咨询机制，推动形成政府、公众、媒体、学者、民间组织等共同参与与保护的工作格局。

以黄埔文冲村为例，该村有着800多年的历史，是广州最大的古村落保留地之一。文冲村在改造中引入市场化机制，统筹兼顾各方利益诉求，最终保留陆氏大祠堂和文冲碉楼等知名古建筑，并以原地修缮和迁移建设的方式建成约1万平方米古建筑群落——广州幸福里，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在此交相融合。文冲村改造也成为广州城中村改造的样板工程。

加强活化利用 让更多历史文化遗存“活”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对于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既要用心用情保护，也要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充分发挥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高品质文化生活需求等方面的作用。广州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广州文化的发祥地，辖区内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广州高度重视历史文化资源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战略价值，系统谋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对于有形历史文化遗产，如古民居、古建筑等，广州不断探索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的新路径、新模式和新机制。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当前，广州正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推动城市环境品质新跃升。城中村改造也成为广州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抓手和路径，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新的活力。展望未来，广州市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在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不搞过度开发，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使城中村改造成为真正的民生工程、发展工程。

（作者系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